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8.06.00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不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终回归历史和实践,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这一选择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并且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前行。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古代中国;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6-0001-07

改革开放之所以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就等同于计划经济,然而通过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也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也是历史智慧对现实的投射,因为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有着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本文从大历史的视角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回顾,进而揭示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一、市场经济存在于古代中国

我们为什么会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结果,也是回归本民族历史的思考。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好的制度应该是“内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良好,是因为这种制度选择符合我们自己的历史。按照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标准,很多人不认为中国古代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此且不论这种看法的偏颇性,我们仅仅强调,市场经济存在于古代中国,且为古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发秩序,在中国和欧洲都有遥远的历史。

只要人们生产有了剩余需要交换,市场和贸易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当然古代的市场规模与所包含的内容与现代社会是不能比拟的,但从促进资源配置的功能看却是一致的。

在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市场交换会自然而然地扩展,市场秩序会自发地形成,中国也是如此。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比如黄土高原土质松软易于耕作),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较早,农业生产的发达必然带来剩余以及手工业的繁荣,必然会促进交换。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在殷商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到了西周之后,市场分工更加细密,已有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说。百工为市场交换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孟子与陈相讨论治国之策时,指出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衣服、帽子、农具都是用农产品交换得来的,这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商品交换的普遍性。由于市场的广布,《管子》《韩非子》这些战国著作便不免要谈到市场经济思想,比如管子言:“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1]48}“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1]44}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正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言:“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2]过去战

收稿日期:2018-10-25

作者简介:隋福民(1972—),男,辽宁阜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国时代,各国之间的贸易还有阻隔,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商人的活动范围增大,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也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汉惠帝尤其是汉文帝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纳了大臣曹参的主张,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以免耗损国力。汉景帝也接受大臣晁错的建议,继续采取“君臣俱欲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经济政策,结果出现了历时40年左右的“文景之治”。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能人给家足,郡国仓廩也堆满了粮食。地区之间的分工倾向也出现了。正如司马迁所言:“山西饶材、竹、谷、鲈、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磬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3]875}“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3]879}

隋唐时期,农业迅速恢复,商业贸易(包括国内和国际)也有一定发展。工商业小市镇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中唐以后更是大量兴起。各种产业不断壮大。由于灌钢法和水排除法的普及推广,隋唐时期冶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据记载,唐宪宗元和初年全国每年产铁量已达103.5万公斤。^[4]铁器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也十分细密。不仅有铁行、铁坊、锻坊,而且有专门生产针的针行、针铺和生产刀剪的削家,以及生产铁釜的作坊,甚至在一些远离矿区的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用废铁来进行冶铸的铁器作坊。冶铜业也很发达,年采铜量至唐宣宗时已达32.75万公斤。^[5]其他产业,如瓷器业、印染业、纺织业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产业发展促进了国内贸易发展,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大为兴盛。日本从7至9世纪先后派了13批“遣唐使”到中国,随同中有许多大商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也颇为繁盛。除了东亚之外,中国与南亚、西亚的联系也很紧密,比如,与天竺、波斯和大食的贸易。而且,通过波斯和大食又让中国的产品传到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

宋时期,由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市场经济更趋发展。北宋时,农作物播种面积扩大,茶树栽培也有很大发展。南宋时,江南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苏州和湖州稻米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棉花种植进一步推广,棉纺织业逐步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与此同时,采矿业、

冶金业、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糖业以及造纸业等官营和民营手工业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在一些大城市里,商业店铺很多,还有名叫“瓦肆”的娱乐场所。由于市场经济需要,纸币“交子”在北宋中期的四川地区出现。宋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当时,泉州、广州、明州是主要港口。在泉州附近至今存有港口、船坞以及伊斯兰教寺院遗址、阿拉伯等国人的坟地、记载中外往来的碑刻等。泉州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6]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市场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当时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生产的粮食、棉花、茶、生丝等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品种多达200多种。有的地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如苏州吴江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到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有上万户人家的市镇。明清两代,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大量贩运盐、布、米、茶、棉、糖、丝、绸、铁器、瓷器等商品,这些商人推动了市场交换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清朝人口比明朝增加近4倍。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大,以至于1500—1800年间全世界(主要是南美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中国,购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明清全国统一市场规模之巨大,整合程度之高,在传统时代罕有其比,李伯重认为同时期的“日不落”大英帝国都无法与之相匹。^[7]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也认为明清时代江南经济及它代表的中国经济并不停滞,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发展,并不落后于英国。^[8]

可见,中国古代不是而且从来不是一个拒斥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曾经存在于古代中国,而且成就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伟业。

二、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

市场经济存在于古代中国,但它与欧洲近代以来崛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同,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主要的产品供给者是具有个体自由的农户。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因此没有大规模的工业

化生产能力,主要都是小商品生产,即个体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工具简单和生产技术一般来说不高的小规模生产。农民不仅生产农产品,也生产手工业商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主要的供给者是自耕农和佃农,是因为他们具有成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必要条件:他们拥有或租有小块土地,拥有必要的牲畜和农具,拥有自己必需的房屋,人身是自由的,不像欧洲的农奴依附于贵族领主,拥有独立的进行资源配置的权利,对外可以自由地购买原材料和出售商品,对内可以在家庭的范围内自主安排劳动力,比如男耕女织。他们以这种方式嵌入到地区的市场经济网络中,繁荣时通过更多地参与到市场经济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萧条时减少市场行为退回到自己的田地行为中获得家族生存下去的保障。他们是构成市场经济网络的一个个小点,点点相连构成了一张大网。按照施坚雅的研究,中国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网络中形成了每一个地区的核心-边缘结构。^[9]由于主要是农民生产且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传统市场的规模很大。

第二,政府的力量与市场如影相随。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公元前221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自此以后,虽然时而出现分裂,但是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中国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及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比如,郡县制让中央便于推出全国性的政策,以便协调各地方的生产和流通。统一币制大大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市场交换,推动了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较早形成。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也有利于市场发展。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政府不仅仅是产业政策、市场制度、法律的制定者,也同时参与到实际生产中,比如,除了民营手工业之外,官营手工业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官营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手工业有“挤出”作用,因为社会总需求是有限的,官营手工业的供给必然减少了民营手工业的供给,然而与此同时,官营对民营也有促进作用。官营手工业的规模生产,为民营手工业的技术提高起了推动作用。官府手工业把众多的具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工作,大家可以“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11]119},与此同时,官府还规定不同工种要接受9个月到4年的技术训练和学习。这都有助于高水平技术的保持和传播,有利于增强知识的溢出效应。

第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一种是“善因论”;一种是“轻重论”。它们几乎同时出现。为了实现“兵强、民足、国富”继而称霸天下的目标,管仲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除了“通权重”即统一货币外,还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政策,以及“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的财税政策,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内外贸易。孔子虽然赞颂管仲,但自己的经济思想却不同于管仲,类似于老子,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这一思想。司马迁的“善因论”来源于“黄老之学”,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即对国家经济最好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顺势引导,再次是通过制定法规加以约束。这符合当时的国家需要,因为长期战乱使得汉初民众亟需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他接连推出了多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先是宣布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继而垄断冶铁经营,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酒榷以及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举措背后的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轻重论”。“善因论”和“轻重论”这两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

第四,“重农抑商”一直是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观念在统治者那里根深蒂固,战国时代,国家之间为了能在竞争中立足各显其能,“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出现,秦汉之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后来的宋元“专卖”以及明清“海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农本商末”观念的体现。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历代都人口众多,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义。而且,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鼓励小农进行农业生产也是天经地义的。当时还认识不到商业和商人对社会变革的引领作用。欧洲16—17世纪重农主义学派的思想其实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他们都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通过劳作使土地有所产出才是财富的增加,而商人或者说商业行为只是将产品进行了空间上的转移,并没有使财富值有所增加,因此是不值得提倡的。

三、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知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否定与重构

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中国未能率先开启“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崛起的欧洲。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让欧洲进入到世界

经济体系。掠夺的金银以及奴隶为欧洲的金融革命、商业革命、农业革命乃至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社会的大门,随后各国的工业化追赶让世界进入到工业时代。农业社会无论怎样发达,在工业社会面前都相形见绌。欧洲人用枪炮开辟世界市场,导致中国由此进入到“落后—挨打—追赶”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计109年时间,这段时间的乱局以及中外差距让中国人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知道中国应该走向何方,不知道中国还能否重新崛起,不知道中国人的未来命运如何,不知道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命运如何,当然也包括不知道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

中国人首先得“站起来”。中国人试验了各种救国方案,也试验了多种思想。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图存始终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洋务派宣称,由封建统治者进行某些局部的改革就可以臻中国于富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派认为,中国的富强有赖于根本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不必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只需变法即可。革命派则声称,只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造中国,挽救中国于危亡。然而,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谁也没让中国走出艰难境地。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才结束了一百多年的乱局,再一次让中国“站起来”。

工业化的追赶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追赶的梦想有了现实的基础。然而那时候面对国内外的的发展情境,我们不知如何选择。种种原因最终让我们选择了苏联模式。苏联当时在世界上属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从政治上也是我们的“老大哥”。于是,中国开始通过计划经济模式来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进程。计划经济模式让中国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化体系,迅速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压低了消费,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强大勒紧裤带过了好多年苦日子。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毛泽东及时觉察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1955年年底,他率先在党内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但之后出现了政策失误和方向偏离,一度使经

济体制的变革搁浅。但总体上说,在当时,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谁也不敢有所突破。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正是解决不了这些矛盾,才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些危机让马克思认识到,市场本身是有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性,从而减少浪费,同时也能解决资本主义体系下所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计划是一个好东西,计划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体现。^[10]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了反思。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教训。正如田纪云所言:“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实践,至少已经证明了一点,就是搞那种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才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11]另一个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我们发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没有计划。相反,计划和市场已成为各国调节经济普遍采用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市场呢?因此,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12]由此中国开启了为市场经济敞开大门的进程。最早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虽然有历史局限,但比过去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市场调节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必须要经历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实上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一致。之后由于经济出现波动,一些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甚至大有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之势。

邓小平南方谈话把市场经济理论推向一个更高

的阶段,完全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姓资”“姓社”标准的范畴,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正是遵循这一理论指导,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也完成了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认知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由此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发展要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重构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出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它可以同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二是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这两层含义,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具有共性,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具有与其他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它要靠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4]之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因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前无仅有的突破。

我们首先从理论角度看。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前提,它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排斥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正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论来源。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空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构成,资本主义部分讲商品经济,社会主义部分讲计划经济。资本主义部分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揭示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指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这里边也没有阐述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没有很好的理论总结,因此,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疑惑,甚至从内心上不认可。一些人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要回归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变形的,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只能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进一步实行经济上的彻底私有化、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宪政。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是由于我们缺乏理论总结和构造能力所致,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如今仍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阐释。

理论上的迫切性缘于我们实践上的成功。改革开放40年来,应该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目前人均GDP排名还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但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已经非常不易。中国的生活水平、预期人均寿命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曾经的那个古老中国回来了。当然,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说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等等。但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主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认识这种经济体制的独一无二性。在当今世界上,大体上存在着四种主要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一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存在于欧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一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于古巴、朝鲜等国家;一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存在于非洲及中东等一些国家;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只存在于中国。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前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多半是一种封建的甚至是更为陈旧的制度和体制,这些制度和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落后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实行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国家往往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计划体制,由于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实行单一的计划管理,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受到严重的束缚;同时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封锁,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法广泛吸收整个世界发展的文明成果。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困难重重甚至是举步维艰,这些国家目前也正在寻求改变。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曾经是最先进的制度和体制,并且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国家对其制度和体制还非常自信,认为这是“历史终点”。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这种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等问题难以克服,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和劳动收益率不平衡就是佐证。

相比于这些制度和体制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从而具有三个方面的优越性: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特有的政治优势;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和优越性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和体制,这正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获得稳步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根本原因。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阐述,并提出了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他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为了避免片面性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5]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实现党所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需要互动前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古人云:“四十而不惑。”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宏大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实际上还达不到“不惑”。从理论上讲,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客观来说,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西方许多国家及其理论界也曾经做过很多探索、实验和假设。比如,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60—70年代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假说,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模式等。但是这些道路都没有成功。中国践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功了,那么,原因在哪里?西方很多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搞了和他们类似的市场经济,中国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彻底的,还没有完全学习他们。然而,一个现实的悖论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走的就是与他们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结果却也不尽如人意。“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推广和试验基本上也是不成功的。那么,中国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不输出强权思想,也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但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乐于以中国为榜样,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的故事呢?目前,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有所阐述,但总体上还不够系统,逻辑性也不够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理论总结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发展。因为,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建立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能不说,需要完善的地方也很多。比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等问题。再比如,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寻租”问题,近些年的反腐力度很大,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也说明理清市场和政府边界的重要性。很多人极力倡导“小”政府,但事实上“小”政府也不一定是解决方案,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而且,目前也有理论证明,政府的支持创新以及增强知识传播、塑造社会的学习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学习能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我们的实践如何去发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作用呢?这些都需要通过实践进行探索。我们认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没有固定的标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可供参考,但不是唯一的尺度。因为无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均表明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既存在着政府失灵,也存在着市

场失灵。亚当·斯密的政府“守夜人”思想实际上并不符合现实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政府需要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作用。而且,制度、技术等都是“内生”的,不存在唯一标准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一个懂得“易”的国度,“易”的思想表明,实践是发展的,据此总结出来的经验也不是固定的;中国也是一个崇尚“中庸”的国度,崇尚“中庸”并不是不求发展和平庸,而是认识到凡事都要讲求一个“度”,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就是一个“度”,这个“度”也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说明,一直变化的符合实践发展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也永远在路上。

总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还需要互动前行。

参考文献:

[1] 管仲.管子[M].覃丽艳,译注.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

[2]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1卷(先秦两汉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195.

[3] 司马迁.史记: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4] 王天伟.中国产业发展史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2.

[5] 管慧娟,郑家茂,郑启航.文物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3.

[6]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梁赤民,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132.

[7] 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48-55.

[8]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言1.

[9]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10] 付高生,李典.马克思跨越设想和恩格斯跨越设想的比较[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5):55-60.

[11] 田纪云.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441.

[12]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1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本书编写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4.

[1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

责任编辑:陈可阔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 Great Pioneering Work

SUI Fumi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The market economy that exists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Modern China's percep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undergone a tortuous process.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tually returned to history and practice and chos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rom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choice is a great initiative,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till needs to move forward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ancient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up